

以文化的力量吸引人 感染人 打动人

——类型文学海外传播热的启示

孙凤群 胡少卿



类型文学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故事,通过作品展现火热鲜活的中国社会生活,彰显中国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人的奋斗与梦想以鲜活的故事表达出来,发出自信响亮的文学声音

近年,中国的谍战、科幻、玄幻等类型文学在海外受到欢迎。日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以详实数据支撑这一事实。报告从图书销量、网络书店销售排行、海外书评网站读者评价等第一手数据入手,展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实绩。2018年3月截取的数据显示,刘慈欣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英译本在亚马逊网站销量排行进入前3000名,而与此同时,一些名声颇高的当代纯文学名家名作英译本销量排名在几十万开外。在书评网站上参与评价的读者人数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关注《三体》等类型文学的读者人数也远远超过关注纯文学的读者人数。这些数字意味着,学界对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关注,已经从早期输出目的地和译本多少、翻译语种多少、收录图书馆数量多少,转向关注作品落地效应。毕竟,有读者才是文学接受的关键。2015年起刘慈欣系列小说《三体》在欧美广受欢迎,2015年初,北美网友开始自行翻译中国的《盘龙》等网络小说,引发数百万英文世界读者追捧。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类型文学在海外传播中具有优势,对海外读者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类型叙事天然携带跨文化流通基因

“类型文学”是伴随网络文学发展而在最近10年内热起来的文艺学名词。它强调以题材和写作模式、套路来划分作品,其内涵相当于以前的通俗文学概念,又有所拓展,可以将一些游走在纯文学边缘地带的作品也纳入其中。“通俗文学”往往隐含旨趣高

雅或低俗、品位高或低、面向知识精英或普通大众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类型文学”的说法则较为中性。类型文学本质特征是以“好看”为宗旨,把读者当成服务对象,在乎读者阅读感受,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愉悦和抚慰,注重文学的想象力。大规模类型文学作品的涌现,必将冲击已有文学认识框架,成为刷新文学观念的契机。

国外译介到中国的畅销书大部分是类型文学,如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丹·布朗的悬疑小说、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乔治·R·R·马丁的奇幻小说等。中国近年类型文学写作成就正是世界范围内类型文学热的组成部分,它们用相似的模式服务全球读者,天然自带跨国界流通能力。这种流通能力的获取,至少依赖于以下三个因素:其一,有一个好故事,有悬念,有吸引力,能为受众带来阅读快感,故事经得起翻译的,在跨语言译介过程中损耗和变形程度低;其二,有人类共通兴趣点,如对未来或异世界的想象、纯智力推理式思维游戏、对人进行深度挖掘等,这会使读者接受起来无障碍、无负担;其三,有一整套成熟的跨国翻译、推广、营销手段。其中译者的翻译水准、版权经纪人的眼光、出版方的市场推广能力这三个因素联合作用,成为影响类型文学能否受到海外市场接受乃至追捧的重要因素。

类型文学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更强覆盖

类型文学海外传播热凸显市场力量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有论者提到,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有一种“用户思维”,只有满足海外读者日常生活需求,使之产生发自内心的满足感,才能走进人心。此前一段时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主要依赖有规模有体系的经典作品译介,这些译介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有时也会出现译介书目和目标读者的喜好、接受度之间有差距的情况,从而影响译介和推广效果。类型文学海外传播则更注重市场需求,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从“译出”到“译入”的变化,即不是先译好了再推送,而是对方主动译入。据称,中国网络小说的许多海外读者因为等不及人工翻译的滞后,甚至通过机器翻译来实时阅读中文更新内

容,这种如饥似渴的读者需求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根本的动力。

类型文学海外传播热凸显海外读者群的扩大和丰富。此前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读者主要是汉学家群体、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和修读文学专业的学生,类型文学传播则使读者群扩展到工薪阶层、青少年、网络游戏爱好者等更为普及的大众读者群,使中国文学更多地在中国文学读物的意义上被接受,通过生动故事和深入的兴趣沟通,更容易加深理解、打动心灵。

相对于“纯文学”,类型文学传播还有一个优势是立体式输出,其传播形式不仅仅是单一文字呈现,而是一个立体运作:制作依附于文学故事的游戏、动漫、电影、电视剧、周边衍生商品等。它携带的不仅仅是“阅读”这个动作,还包括观看、演示、虚拟现实体验等。它对读者的影响和感染是全方位的,是多种载体形式合力之下的深度浸入。这些优势是传统的纯文学无法比拟的。随着中国公司搭建海外网络文学平台,中国网络小说不仅输出内容,甚至输出模式:翻译机制、付费阅读模式、打赏制度、与纸质书同步制作推广的方式等。这些模式有可能在其他文化传播中被效仿,成为世界网络文学的标准配置。

海外需求趋热对类型文学创作提出更高要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无疑为包括类型文学在内的文艺创作指明方向。作为活跃在文学海外传播和交流一线的重要力量,类型文学不能满足于读者粉丝数量和码洋、点击量,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国故事,通过作品展现火热鲜活的中国社会生活,彰显中国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人的奋斗与梦想以“好看”的故事表达出来,发出自信响亮的文学声音;另一方面,自觉树立传播中

华文化的意识,将深入我们血脉的文化基因、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传统以形象生动、可感可知的方式表达出来,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和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以文化的力量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

对照这两个标准,当前类型文学创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类型文学写作处于数量多、精品少的阶段,一些作家还在盲目追求产量速度,一些作品还存在重复、拖沓、单一、陈词滥调的弊病。输出到海外的作品也以仙侠玄幻为主,讲述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现实生活的作品偏少,对中国文化的书写也流于表面,有符号化、标签化、碎片化倾向。在此背景下,类型文学海外传播热反过来对类型文学发展提出更高质量要求。类型文学应该向纯文学学习深度、高度,不断突破类型、激发内在活力,同时也应打开视野,从大千世界和时代现场中萃取故事,琢磨向全球读者传达中华文化魅力的方式方法,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和提炼中华文化精髓精华之间求得平衡。

类型文学海外传播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读者、相信市场筛选机制的力量和眼光,相信在海量作品和充分竞争的环境中,一定会诞生出类型文学精品。大量类型文学征服海外普通读者和少量纯文学在海外特定人群中获得口碑,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合理的文学输出图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类型文学是一个重要突破口,是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契机。鉴于此,我们应该鼓励类型文学的壮大与输出,加强对类型文学的研究,努力夯实适合类型文学作家创作精品土壤,把它们译介到海外,使中国文学不仅走出去,而且走进去。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制图:蔡华伟



修炼“诗外功夫”

李小白

全海,再写一岛。”任何艺术作品的创作都不是孤岛行为,必须先全面了解与小岛相连的整片大海,即要修炼学识。学识首先来源于火热的人民生活。“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道听途说或闭门造车,作品必然是隔靴搔痒。只有走进生活深处、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才能把真实的生活变成感人的故事、丰满的人物、优美的旋律,作品也才能打动人心。学识的获得还需要艺术工作者多读书理,多向其他知识领域扩展、突围。陆游说:“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但凡艺术莫不如此。艺术工作要“专”,“专”可以让我们在某一领域站稳脚跟,但要使作品产生质的飞跃,艺术家见识要广、学问要博。如鲁迅所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会非常有限”。

文章不是无情物,作家如果缺乏生命体验,做不到同理理解,就难免不出现“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欢者虽笑不乐”这样尴尬的作品。巴金谈到,创作《家》时“仿佛在跟一些

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挣扎。”可见,燃烧的情感、深沉的理解是文艺创作重要的内驱力。“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若非有着与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很难写出如歌如泣的《琵琶行》。想要深刻表现事物、传递情感,就必须有对人、事、生活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写自己最感同身受的东西,而不是蹭热点、抢流量,谍战流行就写谍战,古装剧流行就写古装剧,最终陷在跟风的漩涡中,迷失了自我。“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它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走进生活、表现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对生活、对要表现的对象投入真心、真情。只有拆除“心”的围墙,带着真心、带着真情、带着对人民对生活最真挚的爱和理解,才能真正深入读者内心世界,创作出触及灵魂、引发共鸣的优秀作品。

为社会立心、为民族铸魂,是文艺重要的担当和使命。创作主体的德行是否高尚,决定作品格调的高低。如果一个作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我们很难相信他的作

品会充满高尚的情感和向上的精神。自古文人都很注重自身德行的修养,从孟子的“养气”说,到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再到韩愈的“气盛言宜”等,都非常强调创作者道德修为对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创作者的修为境界还直接影响其作品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王羲之、颜真卿书法之所以被奉为经典,除了作品本身艺术水平高之外,还与他们的德行学识堪称一代楷模密切相关。所以德行与创作,是相得益彰的关系,高尚德行催生高尚艺术,高尚德行推动作品传播。在新时代的今天,艺术承担着培根铸魂、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在作品中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使作品给人以光亮、温暖与希望,文艺工作者必先培其德、育其志,提升其境界。育人必先育己,觉人必先自觉,是道理所在。

“诗外功夫”绝非一时半刻之功,需要长期磨炼和沉潜。文艺工作者若能潜下心来,身体力行,必将创作更多经得起时代和历史考验的艺术精品。

译者应耐得住寂寞,但这寂寞并不孤独,翻译搭成的桥不仅联系译者和作者,也联系着两种不同文化和文明,联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有人曾拿着王勃五言绝句《山中》去问朱光潜,“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这首诗该如何翻译?朱先生说:“没法翻译。”

这里的“没法翻译”指的是要翻译得和原诗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汉语和西方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载体:一个属汉藏语系,另一个属印欧语系;一个是单音节表意的方块字,一个是多音节的拼音字母;一个有四声而且韵母非常丰富,一个是韵母相对单调但节奏鲜明。如果逐字逐行,肯定无法翻译。比如,外语写作最忌讳重复使用同一个单词,而在汉语里有时却是修辞手段。当年把《红楼梦》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我们吃尽苦头。像“桃花窗外东风软,桃花帘内展秋眉。窗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之类,如果硬是逐字逐句翻译出来,恐怕非但不是诗,读起来也不成话了。朱先生所谓的“没法翻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诗歌翻译,一般应以“诗译诗”。所以新诗诞生之初,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诗人译诗”,当年译者中的确以诗人居多。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提法有一定局限性。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一篇题为《文学与直译》的文章中所说:“从理论上说,只有诗人才应该译诗;而实际上,诗人成为好译者的情况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利用他人的诗歌作为出发点来创作自己的诗歌。好的译者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他的目标只是一首类似的诗……翻译过来的诗应该是原诗的再现。”在这里引用帕斯的话,不仅因为他是位大诗人,还因为他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翻译杜甫、王维、苏轼等人的诗歌。

诗歌翻译有点像演员表演,是二度创作。好的译者对原诗有透彻的理解,然后又能用自己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地转述原诗内容,关照原诗风格与神韵。当然,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十个译者会译出十个不同的莎士比亚”来。我们平时说的“信、达、雅”或“最佳近似度”,都是一个综合指标,其中就包括对内容与形式、对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的表达,尽可能追求译诗和原诗在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上的和谐与平衡。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百年和译诗百年是同步前行的。翻译外国诗歌目的之一是为本国诗人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丰富和繁荣我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一百年来,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有目共睹。在回首新诗百年时,同样应审视和反思译诗的影响:有无不足之处、有无过誉之处,如何在继承诗歌传统和借鉴外来诗歌基础上繁荣我国诗歌创作,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中国文学现状和动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应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之邀,与西班牙友人一起翻译、校订并出版西班牙文版《红楼梦》。当年西班牙报刊提到《红楼梦》时,总说它是“中国的《堂吉珂德》”。让我颇受触动的是:自1922年林纾、陈家麟合译《魔侠传》以来,《堂吉珂德》在中国已有上百个版本,而《红楼梦》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至今几乎仍然只有我们这一个译本!中国文学经典外译,我们还有很多开拓性工作要做。尤其是面向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很难由国外汉学家独立完成。

因此,我建议采取“转译加审核”模式来推动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工作。例如,要把一部中国文学经典译成西班牙语,首先要遴选出大家公认的好的英译本或法译本,然后请西班牙语高水平译者译成西班牙语,再由我国西班牙语学者根据中文原文逐字逐句审核。这样,既可保证译文质量,又可避免误译,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当译介国出现高水平汉学家,也就无需我们越俎代庖了。

每次谈到文学翻译,我总会想起北京大学西语系田德望教授。田先生73岁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开始译《神曲》,花了18年时间译完《神曲》,老先生随之仙逝。意大利文学专家吕同六为表达对田先生的崇敬之情,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寂寞是一座桥》。这深深感动了我。翻译是寂寞的,译者应耐得住寂寞,但这寂寞并不孤独,因为翻译搭成的桥不仅联系译者和作者,同时也联系着两种不同文化和文明,联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赵振江,1940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著有《西班牙语诗学导论》,译作阿根廷史诗《马丁·菲罗罗》《拉丁美洲诗选》等20余部,主持翻译西文版《红楼梦》。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西班牙伊莎贝尔女王勋章等奖项。

